

# 光未然戏剧文选

---

刘可兴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光未然戏剧文选

刘可兴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光未然戏剧文选**

刘可兴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4 插页 187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59-1944-X 定价：6.80 元  
I · 1364



1988年在深圳。



一九八六年在密云水库。

三十年代中期的光未然。



## 序　　言

《光未然戏剧文选》，是我在三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写的一些戏剧论文的选集，发表时大多用的光未然这个笔名。结集时也加进了近几年写的几篇有关戏剧工作的回忆文字。感谢中国剧协老编辑司空谷同志、颜振奋同志的提议和促进，感谢北师大中文系刘可兴老师的辛勤搜集和编纂，还得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出版业萧条时接纳了这本小册子，使得我在前半生的戏剧活动，留下这么一个菲薄的纪念品。

1934至1936年间，我在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和抗日救亡运动热潮中，曾经和进步朋友们一起，在武汉先后参加或主持秋声剧社，拓荒剧团等业余剧团的多次活动。当时在武汉报刊上陆续发表一些宣传性的文字，现从中选出5篇短文，可看到那时的初生之犊，是在何等艰苦的外部条件，何等单纯的认识程度上起步的。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几篇旧作，是中央戏剧学院胡宁容老师近期提供的。非常感谢！收进这个集子的在上海写于抗日战争前夕的《庸俗的戏剧运动批判》，发表于洪深、沈起予同志主编的《光明》杂志1937年5月号。这篇看问题简单化的偏激之论，得到老一辈文艺家们的宽容

和理解。全国解放后，夏衍同志从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旧杂志，托人转送给我。“文革”中遗失了。后来唐弢同志提起此文，并寄赠复印件。而刘可兴同志为编辑文学资料，也从图书馆的旧杂志堆里发现了这篇旧作，还找到稍后同在《光明》上发表的《战时戏剧引论》。既然如此，我也就同意编进这本选集；加上抗战期间写于二战区、重庆、昆明、1946年写于北平的各一篇，都作为戏剧方面的参考资料吧。

说到参考资料，这本选集的大部分内容，都带有参考资料性质。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六十年代思想上矛盾发展的轨迹；而且通过这一个，还可以看到许多个类似的思想状态：他们为抗日救亡、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不顾身；他们为救亡而文艺、为革命而文艺的时候，却忽视了在斗争中自身的文艺建设（包括自身的理论建设、专业建设）的任务。他们在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每当运动一过，头脑稍稍清醒一些的时候，又赶忙互相提醒并提醒他人：不要在左倾幼稚病上陷得太深……。几十年来，我和我的可以谈心的同志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醒了。还得继续学习，继续思考。当然，坚持文艺为人民、为现实、为社会主义直接间接做些好事的信念，那是始终不动摇的。为此，我提议将去年秋天在武汉参加抗敌演剧队五十周年座谈会期间的两篇文字收容进来，借以表示自己现在达到的认识程度。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工作任务经常变动，很难在一个地方较长时间安定下来，我同戏剧界的关系若即若离了。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在首都先后参与中央戏剧学院、中

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组织工作，这六年多时间，干的主要还是戏剧方面的活动。1950年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教育长，协助欧阳予倩、张庚、曹禺同志筹建建校，兼管一个人数不多的剧本创作室。我的这一段工作，在1952年的文艺整风中，被别人和我自己全盘否定了，事后不愿再提它。1951年至1956年先后在文化部和剧协工作期间，我和马彦祥、周巍峙、李超等同志，曾协助周扬同志、田汉同志从事戏剧方面的建设性工作。开国伊始，大家都还年富力强，都想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多做点事情。当时我曾积极参与以下一些活动：

（一）参加了1951年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引导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综合性的从事文艺宣传的文艺工作团（队）向专业化的剧团、剧院过渡，中央文化部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根据国家文化建设的要求，决定将全国文工团（队）分类加以改编和加强。这在当时，是牵动面较大的文艺工作方面的体制改革。当时中宣部、文化部包括艺术局的很多同志投入了这一工作。这里收入了我当时为《人民戏剧》杂志写的一篇社论作为纪念。

（二）参加了1952年中央文化部在首都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这次会演中，我有幸集中地欣赏我国京剧与各种著名地方戏曲第一流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唱，真是大开眼界，受到很大启发。《戏曲遗产中的现实主义》、《沿着戏曲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二文，是当时学习心得的汇报，意在对于当时戏曲

剧本创作与改编中常见的反历史主义的粗暴倾向有所抑制。

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都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热情而细致的关怀。一些难忘的回忆，我后来在《参天的大树常青》一文写到过。这里，我想补充一点。1952年秋，历时月余的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于11月中旬闭幕时，我受托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正确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当时《文艺报》和各地报纸上转载过）。在社论见报的头天深夜（其实是见报的当天凌晨3时），恩来同志召集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同志（他们审阅过社论稿或清样）和我到中南海谈话。他已看到社论清样，对前面若干段落没有意见，而对倒数第二段笼统地提倡地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一些说法，很不满意。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地方戏曲或民间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和当前的人民斗争题材，是戏曲改革工作中的重要的任务。从这次观摩演出的成绩看来，地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题材，是完全可能的，并已收到初步的成效。目前反映现代生活的戏曲创作的主要缺点，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

.....

恩来同志指着送审稿的这段话说：“地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你们这样写，下面就照你们的话去办，无非是产生大量的‘话剧加唱’，使戏曲失掉群众就是了。

.....”

解放初期，各地文工团为配合政治任务而产生了一批简易的“新歌剧”，实际并不符合新歌剧或新戏曲的要求，文艺

界戏称为“话剧加唱”，演过一阵就不再被人提起。我们也不赞成这种做法。就我来说，我在会演中看到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淮剧《王贵与李香香》的编剧与演出相当成功，比较符合新戏曲的要求，在会演中受到奖励，欣喜之余，就信笔写出那段“完全可能”的话；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这种“初步的成效”，并不是各种地方戏、各地戏曲剧团都能做到的。何况还提出了表现“当前的人民斗争题材”的任务。那时的重大斗争题材，首先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要戏曲舞台及时反映这类题材，那就实际上在鼓励“话剧加唱”和概念化倾向。可见，周恩来同志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他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记得周扬同志说出了我们大家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和接受这个批评。我对于自己的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惭愧得无话可说。可是，当天的报纸已经付印，来不及删改。后来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我现在记不清了。近些年的戏曲工作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一些成功地表现现代生活的优秀作品。可是，周恩来同志当年的郑重提示，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三) 针对解放初期各地戏曲工作中的滥禁滥改现象(这种现象引起演员与观众的很大反感)，文化部艺术局设立了一个戏曲剧目审定组，与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合作，进行第一批京剧剧目编辑审定工作。我曾一度受托照管这一工作。这是真正的外行领导内行。戏曲研究院的马少波、范钧宏同志及编辑处许多同志，艺术局剧目组的张真、戴不凡、李嘴仓、刘乃崇、范溶同志，不辞劳苦地进行了大量繁重而细致的工作，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1953年12月以中国戏曲研究院名义，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京剧丛刊》16集。这

批剧本是跟当时健在的最权威的京剧艺术家们密切合作整理审定的，对滥禁滥改现象起了抑制作用；对各种地方剧剧目的汇集整理工作也起了促进作用。紧接着，《越剧丛刊》《评剧丛刊》等等地方剧目的成套整理本也陆续问世。解放初期这一批京剧与地方剧剧目的整理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归可以作为此后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的基础、起点或参考。本书收进了《改进京剧剧目的整理与审定工作》（发言提纲，未刊稿）。作为一份文化资料，从中可知当时所能做到、所能达到的认识程度。

（四）写于1951年的《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剧、神话剧问题》一文，是当时接受胡乔木同志、周扬同志提议而命笔的。读者只要稍为耐心地浏览几段，可知五十年代初期戏曲工作中反历史主义流行病（极左思潮在文化工作上的一种表现形式）达到何等可惊的程度。由于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可尊敬的老革命，又是我的同事（同是文化部艺术局的副局长，分管戏曲改革工作的），由我来写这样一篇文章，难度很大。乔木同志指点说：“你就要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旁征博引，在报上发表，使读者信服，使他无话可说。”（大意如此）可我并不那么博学善辩，勉力写成这样一篇。自觉文风不好，教条气味重，加之不愿惊动太大，便只在《人民戏剧》上发了。这篇文章，当时还是起了好作用的。直到十几年后，“文革”一来，人家跟我算账了。在一份文艺界红卫兵战报上，连篇累牍地发动攻击，上纲之高，可以想见。文艺上的极左思潮，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这并不奇怪。

（五）我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期间，曾提议创办《剧本》月刊，用以促进话剧创作和新戏曲上演剧目的逐渐兴旺。这

个计划，得到文化部、中宣部的批准，也得到田汉、老舍、宋之的等等老剧作家和很多年青剧作家的支持。1953年以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可以有较多精力来照管剧协主要刊物之一的《剧本》月刊。从1952年到1956的五年间，我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心甘情愿地日以继夜地协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做好这一工作献出全部心力。为了帮助青年剧作家和业余作者较快较扎实地成长，我们曾着意提倡独幕剧，并为此举行了两次独幕剧评奖。短剧评奖而有当时说来不算很少的奖金，这在五十年代是开了先例。收入本书的《谈独幕剧》一文，是为1954年春举行第一次评奖活动而写作。《人民日报》当时为这次独幕剧评奖发专版予以支持。

(六) 我曾投入中央文化部1956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的一些活动，在会上作了题为《在舞台上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性格》的专题报告。记得报告稿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讨论时，主持会议的沈雁冰部长——茅盾同志对我说：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应当指出，可是有的地方批评过多，使作者丧气；还是要多讲点鼓励的话（大意如此）。他说的很对。报告稿根据这个精神修改过。时过境迁，报告第一章开账单似地列举成绩的部分，业已失去时效，又占去较多篇幅，收入文集时删去了。

以下，我想就记忆所及，回叙一下本书收入的五十年代关于老舍同志的两个剧本、六十年代关于曹禺同志新作的几篇评论文字的一些情况，提供读者参考和指正。

我是老舍、曹禺剧作的爱读者。1940年在重庆，解放后在北京，我有幸和老舍同志多次接触，敬重他的为人，感谢他先后对《剧本》月刊和《文艺报》的热情关怀。五十年代

以来，我同曹禺同志结成美好的友谊。我和很多作家朋友们一样，对他俩在全国解放后的新作保持浓厚的兴趣。可是，1953年我评述老舍的《春华秋实》、1955年评述曹禺的《明朗的天》的两篇文章，都没有写好。两个剧本都是为赶任务而命笔（《春》剧为歌颂五反，《明》剧为歌颂抗美援朝），都出自作家高度的热情，可都不是他们的代表作。我的评论既然没有写好，就不用收入文集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六十年代评述阳翰笙同志的剧本《三人行》（歌颂土改）的文章，也未收入。

前几年，我无意间发现了1951年1月一篇书信体文稿《与老舍先生谈〈方珍珠〉》。可以看出，当时是怀着激情写出的。我觉得《方》剧前面大部分非常好，非常动人。可惜后半听从“友人”的劝告改坏了。我恳劝作家按照原来的设想改回来。想不起那时出于怎样的考虑（无非是有所顾虑吧，怕引起某位或某几位“友人”的不高兴），此稿无论作为文章或者作为书信，都一直没有发出去。事隔四十来年，重读之下，深悔当初的胆怯。如果作为书信发出，很可能得到老舍同志的考虑。此外，我补充了一篇1957年12月谈《茶馆》的短文。这是这个剧本发表后、上演前我在《文艺报》邀集几位同志座谈时的即兴发言。在会上相继发言的焦菊隐、陈白尘、夏淳、王瑶、张恨水、李健吾、林默涵等同志都谈得非常好（见《文艺报》1958年第1期）。作为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我有几段插话。现在把那些原话抄录组接起来，成为一篇短文，略表我对敬爱的老舍同志的深切怀念。单谈剧本，当时虽然一致赞扬，但还对它估计不足。看了演出，才把人吃惊地镇住了。这是真正的艺术魅力！现在《茶馆》的剧本和演出，已

成为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每提起来令人神往。

五十年代初的两三年中，我和曹禺同志同住在铁狮子胡同3号小院内，朝夕相处，谈得较多。我曾有意写一本《曹禺论》，把他的几个名作的妙处（从立意、构思到炼句）“挖出来”，供青年剧作家们学习和参考。我把自己的设想跟他谈了，还为此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亲自交给他。他很高兴，写了长信复我，亲手送给我，表示愿提供无条件的全面的合作。他的房屋的后窗跟我的卧室的前窗正对着，前后房紧挨着，还要互通长信，自充邮差，可见写书的意向，都是郑重对待的。事后由于我被拖进这样那样的事情中，加之文艺界的风浪接连不断，这个美好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真是终生憾事！我的这个遗憾，决不是收入本书的评论《胆剑篇》的三篇文字所能弥补的。已故友人唐弢同志，曾经称赞《胆剑篇枝谈》是用另一付笔墨写评论。我觉得另外两篇短文，谈《胆》剧思想性和语言美的，略有新意，也都是从曹禺的这一新作触发出来的。曹禺近年患病，长期住院治疗。祝愿我们的天才的戏剧诗人康复健壮起来！

这个选集中，有几篇文章过去曾收入《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1957年戏剧出版社本）及《风雨文谈》（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本）。两书都已绝版。此书中也有几篇是过去未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稿，将在文末分别注明。

我自195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主持《文艺报》工作后，看戏看剧本少了。1979年因肠癌经过两次大手术后，生活习惯改变，由多年的夜间工作改为早睡早起，从此牺牲了晚间看戏看电影的艺术享受，也就完全失掉了对于剧影艺术的发言权。但每回听到有新的好戏好电影上演，都要高兴一阵。我

国戏剧、戏曲、电影艺术界新人辈出，确实可敬可贺！

为了约略说明本书内容及写作背景，我写出这样一篇序言。我说的是不是太多了？

张光年

1992年12月10日于北京。

##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辑 (1935年—1946年)	
戏剧教育 .....	3
当做革命事业看的戏剧运动 .....	5
什么是戏剧运动 .....	7
抗议 .....	9
上演《洪水》的意义 .....	11
庸俗的戏剧运动批判 .....	13
“战时戏剧”引论 .....	23
展开第二战区的戏剧战线 .....	27
一年来的戏剧运动 .....	30
试评洪深新作《包得行》 .....	34
诚实的作家，诚实的导演	
——评《禹禹草》的演出兼论大后方戏剧运动 .....	36
表现民众忧患的剧人们 .....	39

## 第二輯（1950年—1962年）

秧歌舞和秧歌剧如何提高	43
与老舍先生谈《方珍珠》	48
关于剧本《茶馆》的即兴发言	53
祝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开幕	56
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剧、神话剧问题	
——评杨绍萱同志反历史主义的倾向	62
戏曲遗产中的现实主义	77
沿着戏曲的现实主义轨道前进	
——关于戏曲的民间传说与历史题材的创作和改编问题	89
戏剧创作的概念化倾向（1949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创作情况的总结）	105
改进京剧剧目的整理与审定工作	121
谈独幕剧	127
给超克图纳仁同志的信	
——谈剧本《巴音敖拉之歌》	134
在舞台上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性格	140
话剧的节日（为《文艺报》1956年第4期所写的社论）	16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文艺报》1956年第10期所写的社论）	173
《胆剑篇》枝谈	179
《胆剑篇》的思想性	193
关于戏剧语言的杂感	199